

重繪城市： 論《猴行者：其偽書》的族裔空間*

蘇 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E-Mail: jungsu@cc.ntnu.edu.tw

摘 要

本文以傅柯式空間概念重讀《猴行者：其偽書》。以空間種族化概念分析離散族群反抗城市空間之區隔化。主角慧特曼·阿辛生於舊金山中國城，卻想越界加入主流社會。他離經叛道、挑戰主流論述，欲以重新命名創造生存隙縫空間，更搭火車西行，沿途朗誦文學作品，結合閱讀、土地、文學傳統，繪製美國新市景。漫遊者阿辛最後回到中國城，鼓勵族人一起重繪社區面貌，再現華人新形象。

湯亭亭筆下的阿辛實為美國文學多元文化光譜增添異色，然如何跳脫再現迷思和同化／疏離的兩極思考，使華裔美國文學研究具薩依德式入世性，卻是亟待思考探討的議題。

關鍵詞：城市、湯亭亭、空間、異托邦、傅柯

投稿日期：90.3.19；接受刊登日期：92.2.11；最後修訂日期：92.4.7

責任校對：林鈺婷、陳銘杰

* 筆者感謝：何文敬、紀元文教授、徐秀儀、曾嘉琦、王嘉蘭小姐在論文撰寫期間提供、蒐集論文相關資料；金允子、楊意鈴同學協助文字輸入。另外，論文發表及修訂期間，承蒙林耀福、廖炳惠、張瓊惠教授提供寶貴意見，李有成、單德興教授提出問題令我自省，張小虹教授指正引文疏漏，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和建議，使拙文得以修正部分訛誤和盲點，在此一併致謝。

壹

城市的興起、變遷、及其族裔空間配置和族群文化記憶，就文化發展的過程而言，一向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下，城市不但是不同階級、文化和族裔匯聚、融合、衝突、競爭的中心，更是各種疆界鬆動、解放、衝突、競逐的場域。就美國文化而言，城市空間分布更和種族、遷徙、移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薇斯特伍德 (Sallie Westwood) 和威廉斯 (John Williams) 在合編的《想像城市：文稿、符號、記憶》(*Imagining Cities: Scripts, Signs, Memories*) 中曾嘗試將城市的概念理論化，並引述凱斯 (Michael Keith) 對城市空間和多重主體性的看法：¹

理論上，城市空間(複數)無法重建已失去的認同確定感、或將喪失中心的主體凝聚於中心，這正因為都市空間本身就在都會空間性的多重論述中生成。他們迴盪著競逐的政治意涵，是爭鬥的場域，本身早被除去中心，因而其產生認同的過程總是隨機的。(Westwood & Williams, 1997: 8)

由凱斯的論述可以明白看出，他認為城市空間和認同之間的關係並非絕對，而是相對；更重要的是，這種相對性是隨機的，隨著被去除中心主體的分裂，和都市空間性多重論述的不斷衍生，都市空間可以產生不同的競逐意涵。這種政治意義的競逐在多元族裔、離散社群徙居的後現代都會，尤具特殊意義。多元族裔的歷史，藉由文化記憶的再現和再書寫，往往成為徙居族裔爭取、對抗既成的空間分布、重新自我定位，和確認位置性的基礎。藉由書寫、再現的行為，重新創造歷史，在延續文化傳統或與之決裂的兩軸² 間創

¹ 有關凱斯的說法，請參考 Cross & Keith (1993)。

² 關於延續和斷裂的概念，霍爾 (Stuart Hall) 已有非常詳盡而精闢的闡釋，請參見

造曖昧空間，在加入主流論述，並披荊斬棘開闢屬於一己空間之際，調整個人和社群的關係，進而重新繪製「我能參與(主流社會)且置身其中」的雜種(hybrid)城市新地圖。

以下借用卡爾特爾 (Paul Carter) 和馬勞夫 (David Malouf) 在廣播對談中討論卡爾特爾在《通往巴特尼灣之路》(*The Road to Botany Bay*) 所提出的「空間性歷史」(spatial history) 概念，來進一步檢討空間和書寫、文化再現的關係。卡爾特爾認為：

命名的行為並不產生於某一個地名被發現之後，實際上空間是經由命名才被描述，才具有某種特質，某種能被指涉的(意涵)。語言行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空間的創造，由此我們才得以前進到某個彼處。並非原來已有某個場地，某個已經存在的地方，使事件得以隨時間展開——早期歐洲占據澳洲的重要事件必然和創造一個「澳洲」有關，亦即一個被命名的網絡，透過它，並且以此為觀點，某些歷史事件才得以發生。(Carter & Malouf, 1989: 173)

對早期的殖民拓展而言，「靠岸是一種行動，開墾空地是一種行動，但只有在那時，歷史才開始發生」(Carter & Malouf, 1989: 173)。馬勞夫對「空間性歷史」做了更簡要的詮釋：「沒有先存的空間，沒有先存的場域；我們必須做的是創造空間」(1989: 174)。而卡爾特爾更以「未完成的地圖」(incomplete maps) 來比喻空間和描述空間的語言之間的關係：「語言仍不斷被書寫並覆蓋在地圖的想像性空間之上，因此這些地圖是暫時性的」(1989: 174)。

卡爾特爾和馬勞夫的這段討論傳遞了幾項重要訊息。第一，歷史事件的開展相對依附於某個空間的占有，反過來說，空間的定義

Hall(1987: 44-46; 1989a: 68-81; 1989b: 9-12; 1992: 273-326)。此外亦請參見何文敬(1994: 89-113)。

也相對地以歷史為參數；第二，空間的占有和特質取決於命名，即語言的描述、再現、定意網絡的設定；第三，殖民的墾拓、占有空間掌握了語言行動決定空間特質的權力。換言之，沒有絕對先存的單一空間，只有透過想像、權力支配、社會網絡投射出的空間，而且這些複數空間的意涵，使與其交錯的歷史座標產生了某種詮釋上的意義。這個結論點明了空間分布和權力、語言表達權、文化再現、族裔、社群、歷史脈絡之間具有微妙的牽引關係。

這種相對性的空間解讀，是十分傅柯式 (Foucauldian) 的。事實上，在論其他空間 (“Of Other Spaces”) 一文中，傅柯 (Michel Foucault) 已提出兩種相對概念，對相對性空間做出開創性的闡釋。簡言之，傅柯提出「異托邦」 (heterotopia) 以相對於「烏托邦」 (utopia)。所謂烏托邦，自然「不是真實存在的地方」 (“sites with no real place”) (Foucault, 1986: 24)。傅柯認為，每一個文明都存在著真實的地方 (real place)，每一個社會創建之初，都會有效地按照某種預設的烏托邦形成。相對於烏托邦，異托邦便如同由虛構的鏡子所投射出的幻像，這面鏡子一方面可視為烏托邦——因為它使我看到我處在我不在的地方，在一個虛擬而通向鏡面的空間，透過此幻影提供一種可見性，使我知道我在那裏，我卻也不在那裏；另一方面，鏡子也提供了異托邦的功能——如果鏡子真的存在於現實中，則它會產生一種反作用，使我在凝視時，由鏡中的位置觀看我所處的位置，進而重新建構我所在的位置 (Foucault, 1986: 24)。因此，我當下所處的位置和我周圍相互關聯的空間，一方面絕對真實，另一方面又絕對不真實，因為我必須透過某個虛擬的點觀看，才能確知它在那裏 (Foucault, 1986: 24)。

以上這段以鏡像為隱喻的闡釋，相當耐人尋味。「投射」決定真實，換言之，主體和空間的關係可以是阿圖塞式的 (Althusserian)，個人經由投射、凝視，歷經某種類似被召喚的過程，重新意識到自

已在環境中的位置性、功能性、社會性，或配置的地位，進而被規訓 (disciplined)、監視 (policed)、配置 (allocated)，或被指涉 (signified)。傅柯在接下來所舉的幾個範例中，簡述了異托邦必然遵循的原則，他以監獄、療養院、墳場、劇院、節慶活動、妓院、殖民地等為例，³ 說明異托邦是一種經由射投、想像、設計而存在的虛幻空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殖民地的描述，傅柯認為相對於妓院，殖民地代表的是重新創造的另一個真實空間，其理念是：相對於我們現存凌亂的、拙劣建造的、混雜的 (messy, ill-constructed, and jumbled) 社會，殖民地必須盡可能地完美、鉅細靡遺、布置完善 (as

³ 傅柯以妓院和殖民地為例，認為兩者分別代表異托邦之幻想特質的兩個極端：妓院代表將人類生活功能完全切割、區域化、零碎化的空間，譬如作為發洩性慾的空間；殖民地則代表鉅細靡遺理想化再現人類一切生活的憧憬 (Foucault, 1986: 27)。當然，如果他有機會讀到巴巴 (Homi K. Bhabha) 對於被殖民者模倣殖民者，進而以雜對抗純的理論，其論述或會有所改觀。

此外，傅柯的說法也有其盲點，駱里山 (Lisa Lowe) 就曾在《移民法案》(Immigrant Acts) 一書中質疑傅柯所提出的異托邦空間區隔，認為異托邦的存在暴露了一件事實——即公眾和私人、休閒和工作，以及合法和非法等領域其實難以截然劃分；羅麗紗並以中國城為例，說明中國城是一個隨歷史演變而形成的「沉澱的社區空間」(sedimented community space)，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城同時是主流社會空間配置下被邊緣化的脫軌空間 (deviant space)；另一方面，它所具有的地域性也展現了某種挑戰國家空間 (national space) 的反抗性 (Lowe, 1996: 122)。以此證諸《猴行者》，不難發現阿辛之出走中國城，以及最後企圖重新建立華裔美人的新社區，的確填補了傅柯在建構異托邦理論時的空缺——即異托邦隨其歷史參數所衍生的流動性，不但可能鬆動其原有界線，更可能反過來挑戰原權力機制所強加其上的社會性和社會功能。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並不代表傅柯視空間為複數而固定不變的存在。在另一篇顯然晚於〈論其他空間〉的訪談中，傅柯認為「空間對以任何形式存在的社區來說，都是基本必要的；對權力的運作也是如此」；隨後他提到曾在一九六六年受一群建築師之邀而提出「異托邦」的概念 (Foucault, 1993: 168)。在這篇訪談中，他曾反覆強調，建築物本身並不能強制執行權力機制所欲達成的監控功能，其功能也可因執行方式的改變而成為充滿自由解放的空間 (Foucault, 1993: 162-164)。換言之，空間的設計和運作網絡的配合息息相關，其運作的目的性和成效，視其配合關係而可隨機改變。遺憾的是，傅柯在此並未將歷史性帶入。

perfect, as meticulous, as well arranged), 以做為對雜亂現狀的一種補償 (Foucault, 1986: 27)。雖然傅柯以汪洋中的船做為隱喻, 暗示任何文明如果缺乏船隻——沒有固定空間的空間, 能自成天地、又能向海洋的無限性開放——則夢想將枯萎, 偵察將取代探險, 監視將取代海盜 (Foucault, 1986: 27); 但殖民地的投影對他來說, 終究是「尋找藏在他們花園底下最珍貴的寶藏」 (Foucault, 1986: 27)。儘管傅柯倡言解放意識形態, 在二十一世紀重讀這個以殖民地為例的闡述, 卻可以看出種族主義得以立足的根源——以自我為中心投射出的空間想像, 排除了他者 (other) 冒現的可能性。因此, 殖民者的空間相對於原住民、後來的移民、徙居者, 其實是相當同質且指向自我的。

這也是西方後現代都會中隱然存在的問題——「種族」、「族裔」、以及它們背後所挾帶的歷史、文化遺產、傳統決定空間的操控、定義和再現。因此, 西伯里 (David Sibley) 所謂的「排除的地理」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指的並非人口統計學上都市空間的區分, 而是連接社會層面和精神層面的想像關係 (Westwood & Williams, 1997: 9)。談到空間和族裔的想像關係, 讓我們再回到傅柯。傅柯在「統治的本質」 (“Governmentality”) 一文中, 曾以考掘學 (archeology) 的方式, 耙梳西方自十六世紀馬奇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提出《君王論》 (*The Prince*) 以來, 至十八世紀發展出以經濟介入國家統治之概念轉變, 他指出其中最主要的概念變革, 在於統治藝術 (the art of government) 由從上而下的統轄 (the art of sovereignty, 以君主為中心), 逐漸轉變為對人和事物關係的配置和控制 (1991: 93)。簡言之, 對領土的控制遠不如對構成其臣民的人口、以及和人口息息相關的各種事物的控制來得攸關政權之維繫 (1991: 93)。傅柯又提到, 國家只是「一個神話化的抽象體」 (a mythicized abstraction) (1991: 103), 對人口及其細節的控制和規訓才是統治的基

礎(1991: 102)。此處的分析提供了一則有趣的訊息，即地理空間其實受制於想像以及其背後操控的規訓和統治。換言之，「空間」(space)是經由想像、指定過的「位置」(place)創造出來的。傅柯試圖翻轉西方權力運作的論述方式，重新建立一套系譜學(genealogy)，但他在討論「人口管理的深度和細節」(the management of population in its depths and its details)時(1991: 102)，卻未能觸及種族、族裔等議題。事實上，族裔空間背後的主要支柱——種族主義論述，正是這種特殊性(specificities)的具體表現，並成為西方社會某些團體維持統治優勢的運用機巧(tactics)。借用傅柯的辭彙來說，種族主義可以發揮內化性監控功能，以身體的可見性為主要意符(signifier)，提供最佳的條件以利監視(surveillance)或認同(identification)(Westwood & Williams, 1997: 9)。這種內化的自我監控，以傅柯所創的八角監獄(panopticon)的隱喻來表達，即為「內化式監控」(panopticonism)；種族主義論述所著重的是透過內化的價值觀展現對肉體的自我監控和規訓，進而也透過建制滲入對空間的佈署。「他者」的可見性變成這種生物力量(biopower)的一部分，此力量更可將視境的範圍轉移到種族主義所佈署的建制場域外，成為一種普遍化、廣為散佈的種族主義，以成為構成主體、主體性、以及反抗的權力機制(Westwood & Williams, 1997: 9)。二元式對立(白/有色；善/惡；自我/他者)的現象便往往在空間中展現。

以上都會空間種族化的現象，在許多離散社群聚居的城市尤其明顯，諸如英國倫敦的東區和西區、南亞移民社群，美國大都會中的中國城、以及少數民族居住的聚落(ghetto)如猶太區、黑人區等，皆為不同社群被空間化的顯例。英國當代著名的都市社會學者簡克思(Chris Jenks)在探討社會空間與都會文化時，也曾借用傅柯的說法：「人們被空間化、分隔、再次分隔、聚集，因此更易於處理」(1995: 144)。這種先存於真實空間的投射性假想造成的地理區隔，

產生了簡克思所謂的「具威脅性的地理」(minatorial geography) (Jenks, 1995: 145)；簡言之，地理的區隔不但由政策所刻意規劃，也經由內化過程，在居民心中形成自我制約和區隔，因而預設某些區域適合某種人從事某種活動(Jenks, 1995: 158)，或者某些地區具有危險性和高犯罪率(Jenks, 1995: 157)。在此欲補充說明的是，這種區隔往往和文化刻板印象(尤其對少數族裔而言)、以及對「未知」的陌生和恐懼產生交互作用。對文化的刻板印象和陌生，不僅促使空間區隔化和隔離化(ghettoize)，並將社群的屬性加以想像性地同質化。相對地，區隔化的結果使社群更加隔絕封閉，並且內化這種想像的同質性，對內嚴厲要求社區成員同質化，視異化(或同化主流)為離經叛道。因此，對置身於大都會中心的離散主體而言，斷裂或延續固然是無時無刻必須面臨的抉擇，如何在主流社會已經配置好的空間、已經書寫過的歷史中，重新創造競逐的空間，重新編入文化記憶以創造歷史，繪製能找到自己座標所在的城市地圖，更成為加入文化形成，抵抗主流文化之同質化、刻板化的象徵性行動。

貳

以上所鋪陳的傅柯式空間解讀，以及都會空間區隔化的論述，或許有助於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湯亭亭的《猴行者：其偽書》(*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關於《猴行者》，過去已有許多著名的中外學者著眼於性別越界、文化屬性、文化翻譯等議題，⁴不

⁴ 這其中國內的論述就包括了張小虹的〈雜種猴子：解/構族裔本源與文化傳承〉(單德興、何文敬, 1994: 39-60)和〈獨腳戲：《猴行者》中的性別越界〉(何文敬, 1995: 295-315)；康士林的〈七十二變說原形——《猴行者：他的偽書》中的文化屬性〉(何文敬, 1994: 61-87)；莊坤良的〈文化翻譯與湯亭亭的三重猴戲〉(《歐美研究》，32, 4: 705-739)。此外，張敬珺、單德興、林茂竹、何文敬、梁一萍等多位學者都曾就湯亭亭的作品發表過論文，此處不一一詳列。

過，除了已廣受討論的文化認同定位，以及華裔美國文學圈族裔與性別意識形態發展上的癥結——諸如對華裔美國文學英雄傳統的批評，以及反抗父權宰制的女性主義運動等等（張小虹，1995: 301），我對湯亭亭將故事發生的起點設於舊金山感到饒富意義。⁵ 首先容我追溯《猴行者》出版前十年的《金山勇士》（*China Men*）。在《金山勇士》中，⁶ 湯亭亭選擇了三代中國男性，描述他們到美國工作與居留的經驗，揭露他們受到種族歧視的困境與對抗方式，進而肯定華裔移民對美國社會的貢獻。這其中，太公、阿公和爸爸分別代表在夏威夷的華工、十九世紀末修築橫跨美國大陸鐵路的苦力，以及二十世紀初在紐約和舊金山經營洗衣店的洗衣工人。整體而言，「金山」一詞總括了早期華工的美國夢，以及早期華工對美國大陸的幻想性投射；然而身為後到的移民者，又屬於社會的從屬階級（*subaltern class*），華工移民社群在美國社會始終是隱性人口，他們從未真正占有空間，他們的「不可見性」，正如巴巴（Homi K. Bhabha）引述葛蘭姆西（Antonio Gramsci）的概念時所言：「（不僅是一個受壓迫的團體）而且缺乏自主性，從屬於另一社會團體的影響或支配，沒有自己的支配地位」（Bhabha, 1994: 59）。史書美在分析《金山勇士》時也提到：

湯亭亭運用歷史資料、口傳故事、中國古代傳奇小說、各國神話、以及她獨有的想像力編成這集體經驗的集錦。她試著

⁵ 當然阿辛的出身背景很難不令人聯想到趙健秀（Frank Chin）筆下的「唐老亞」（“Donald Duk”；此處譯名從李有成）。在《唐老亞》一書中，唐老亞的夢境再現了華裔移民在美國築鐵路的歷史，而主角唐老亞本身則是一位生長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少年，他的混雜性和邊陲性使他排斥與中國有關的一切（李有成，1994: 124）。顯然湯亭亭有意藉嘲諷此角色批判「趙健秀式的英雄主義」（李有成，1994: 122）。有關趙健秀在《唐老亞》一書中所欲建立的中國英雄主義，請參見李有成（1994: 121-127）。

⁶ 此書譯名從單德興的譯法。此構想乃源出單教授訪問湯亭亭時，作者提及原書題名為「金山英雄」（“Gold Mountain Heroes”）（單德興，2000: 89）。

以這種織錦重現華美之血汗史，索取其在美國史中不可抹滅的地位，批判美國史忽略少數族裔貢獻的白人中心主義，揭發美國主流社會之權力架構。中國男子在放逐之地美國，被迫住在社會之邊緣地帶，無法進入社會之中心，即是由此種中心／邊緣 (Dominant/Marginal) 之權力運作而來。(1991: 152)

一九八七年之後出版的《猴行者》顯然是此移民史詩的擴大與接續，不同的是，這本書將時空拉近到六十年代的舊金山，以最具代表性的美國詩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 為嘲仿對象。書中主角慧特曼 阿辛 (Wittman Ah Sing) 雖然身為第五代華裔移民，卻仍無法擺脫其先祖「沒有空間／位置」的焦慮；他滿懷理想，反抗種族主義、反戰，雄心萬丈地想融合中國古典小說 (特別是成為口述文學素材的章回小說和民間神話) 和歐美文學傳統為一體——這一切都由他在小說中七十二變式的即興演出窺出端倪：⁷ 畢業於柏克萊加大，二十三歲的華裔青年阿辛歷經民權運動，曾是校園詩人，他在公車上朗誦詩給乘客聽，在百貨公司玩具部門當售貨員，卻因和顧客衝突被解雇，追求漂亮女人，以「劇作家」名義申請失業救濟，娶白種女人為妻，旅行到沙加緬度 (Sacramento) 拜訪雙親和姑媽，逃避兵役，雄心勃勃地撰寫劇本，企圖建立一個「美國梨園子弟團」(The Pear Garden Players of America)。

對照《金山勇士》中的先祖，阿辛無疑更雄心萬丈，積極介入美國社會，但這並不表示身為第五代華裔美國青年的阿辛能成功地在主流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阿辛大學畢業後一直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因而在所生活的都市中像邊緣人般地遊盪著。離散主體所

⁷ 莊坤良曾就《猴行者》一書副標中的「偽書」(fake book) 一辭提出解釋：「所謂的『偽書』係指爵士樂手使用的樂譜，是一本由簡譜集合而成的書」，並點出其特質乃是即興式的；此外，也含有「模倣」的意思 (2002: 723)。

難以逃避的種種情結：中國城的社區意識、膚色、身高、髮色、眼珠（簡言之，身體特徵）、種族、華裔美人刻板化的文化屬性（內向、服從、陰柔等），始終如緊箍咒般地控制著他。

阿辛的虛榮、離經叛道、反戰、以及對膚色、髮色的質疑，代表他對主流社會以生物力量內化宰制的一種挑戰和反抗。正如前面的理論鋪陳中所提到的，種族主義得以著力的最佳場域，在於透過身體展現它內化監控的權力，並以身體的可見性為主要意符。對於像阿辛這種出身背景的人，身體特徵的可見性往往直接連上文化刻板印象，進而產生邊陲化、隔離化的效果。因之一切與來自中國城有關的刻板屬性，使他永遠在這個城市中感到格格不入，而他的焦慮和抗議也常源自於此。即便已經是第五代華裔移民，土生土長於加州，祖先和乘著五月花號來新大陸的人一樣久遠，阿辛仍有被視為「外國人」或「剛下船的移民」（Fresh-off-the-Boat）的疏離感（Kingston, 1989: 41）。當他陪伴一名叫露薏絲（Louise）的白種女孩參加零售大會時，因為沒有被邀請而遲遲不敢進入會場，等他後來進了會場，露薏絲對他說「還好，你夠高」，阿辛當下反應：難道身高可以彌補膚色嗎（Kingston, 1989: 57）？這種焦慮直接反映出阿辛在空間置配上的邊陲性，以及他想要抵抗這種邊陲性的強烈企圖。當阿辛發現會場上的「東方人」——華裔女孩——都集中坐在前排時，他拒絕和其中任何一位打招呼；此外，阿辛也不願和班上唯一的中國女孩走在一起，或被分配到和外國交換生同一寢室（Kingston, 1989: 59）。歸究其因，在於一旦自動加入那個被「虛構的族裔性」（fictive ethnicity）（Westwood & Williams, 1997: 10）所投射的邊陲化空間，他便會被抽象化、普遍化為某一同質化的屬性，從而被邊緣化為囿於移民社群空間的「他者」。

阿辛也藉此對以西方為主的審美觀提出質疑，並抵抗這種內化的宰制加諸於認同的枷鎖。他問道：「難道高加索人種比其他民族

在外貌上的變化多得多嗎？難道他們真的不能分辨『黑人和華人』的差異，只因為我們都有棕色眼珠和黑頭髮嗎？」(Kingston, 1989: 59) 言下之意，白種人因為自我中心作祟，在髮色、眼珠的顏色上只區分得出自己的差異而忽視其他民族的差異，一律以刻板印象將之同質化。阿辛首先細數白種人的髮色，包括「紅(髮)」(red)、「草莓紅的金(髮)」(strawberry blonde)、「洗碗水色的金(髮)」(dish-water blonde)、「白金」(platinum)、「金棕」(auburn)、「褐」(brown)、「黑」(black)、「灰白色的金(髮)」(ash blonde)、「蜜色的金(髮)」(honey blonde)，和「太妃糖色的金(髮)」(taffy)等(Kingston, 1989: 59)，然後他問：「到底是有這麼多種金色，還是有這麼多種描述的辭彙？」(Kingston, 1989: 59) 他得到以下結論：有這麼多名稱和髮色的原因是白種人對自己的差異「有興趣」，因此按不同的色差賦予它們名稱(Kingston, 1989: 59)。

命名在此成為重要的象徵性行為，因為它帶代表存在，占有某一個想像空間，以及具有某種特殊屬性。阿辛所抗議並呼籲白種人正視的，就是華裔美人屬性的抽象化和同質化，因此他也根據黑髮的色澤差異，賦予華人髮色不同的名稱：「茶壺黑」(kettle black)、「砲彈黑」(cannonball black)、「保齡球黑」(bowling-ball black)、「甘草色」(licorice)、「漆皮黑」(patent black)、「緊身舞衣黑」(leopard black)、「藍寶石黑」(black sapphire)，以及「貓眼石黑」(black opal)等(Kingston, 1989: 59)。⁸

⁸ 黑人女作家賀絲頓(Zora Neale Hurston)在《憤怒》(*Spunk*)一書中，有一篇〈哈林俚語中的故事〉("Story in Harlem Slang")，其後附有〈哈林俚語釋疑〉("Glossary of Harlem Slang")。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色差」(color scale)項下，陳列了區分不同色澤的辭彙，多有負面的含義，如「淺黃」(high yaller)、「黃」(yaller)、「淺棕」(high brown)、「凡士林棕」(Vaseline brown)、「海豹棕」(seal brown)、「深棕」(low brown)、「深黑」(dark black)等。至於髮色，則更可明顯看出內化的價值觀：如「壞毛(色)——黑鬼的毛髮」(Bad hair—Negro type hair)、「好毛(色)——高加索人(白人)的毛髮」(Good hair—Caucasian-type hair)等(91-93)。相較於賀絲頓

不過，外表特徵的刻板化或許還比不上人格特質的刻板化更令人難以忍受。有一次學校實驗室刊登廣告，徵求華裔美國學生做心理測驗，酬勞是五十美元，阿辛自告奮勇參加，結果卻讓他感到萬分羞辱痛苦。當實驗室助理逐一唸出一連串定義人格特質的形容詞時，在座的華裔美國學生必須將這些特質一一分類，標示在屬於美國人或中國人的一方。令人難堪的是，儘管阿辛把正面的特質都填在中國人這一邊，結果卻令他洩氣。當「勇敢」、「沈默」、「笑」、「恐懼」、「隨和」、「認真」、「直爽」、「迂迴」、「熱情」、「冷漠」、「冒險」、「謹慎」、「無憂無慮」、「勤勉苦幹」、「開放」、「保守」、「慷慨」、「簡樸」、「善於表達」、「拙於言詞」、「好玩」、「勤學」、「善於運動」、「勤奮」、「外向」、「內向」、「狡猾」、「好交際」等形容詞被一一唸出時，美國人這一邊得到了大半正面性描述辭彙 (Kingston, 1989: 328)。更令阿辛沮喪的是，當天他打開報紙的科學版，赫然讀到以下頭條：「來自東方的大一新生維持童貞的狀態最久 / 白種男孩最容易也最快發生性關係」(Kingston, 1989: 328)。當下他感到這個心理測驗彷彿借科學之名測驗他的童貞，並且給他的人格特質貼標籤。最令他氣憤的是，投票者竟是一群華裔美國學生。他們不但如此自我定義，更承認以上的分類。

事實上，這種想像性投射不僅內化為許多華裔美人的價值判斷，對阿辛這類極力在主流社會尋求自我定位的華裔移民後代而言，也造成兩難的窘境；他既不願回到中國城接受隔離，也不能在生存的城市找到屬於自己(或讓自己感到自在)的「想像社群」。因為不管是回到中國城或離家，都必須承受雙重刻板化屬性的檢

列出的辭彙，湯亭亭之為華人的膚色、髮色重新命名，明顯有想扭轉這種內化價值觀的企圖心。

驗——來自中國城的價值規範，和來自主流社會論述形塑的刻板印象。因此，當他問女友李南希 (Nanci Lee) ——一個來自橘郡 (Orange County) 中產階級家庭的華裔女孩：「妳不是來自洛杉磯嗎？為什麼妳不回去？」他隨即想到：「回家沒那麼容易，回到中國城，他們會對你惡眼相向，叫你『生鬚佬』 (saang-hsü lo)、嬉皮士 (Beatnik)。」 (Kingston, 1989: 10-11) 誠然，對成長於六十年代、出身柏克萊的阿辛來說，六十年代的反戰、性解放、嗑藥等反叛思想的洗禮，使他成為不折不扣的「披頭 (散髮) 世代」 (Beat Generation)，⁹ 以這樣叛逆的形象出現，在當時西方主流社會尚且引人側目，更遑論回到保守封閉的中國城。歷史性和空間的區隔化，使阿辛更加陷入一個門檻性的空間 (liminal space)。¹⁰ 因此，阿辛雖然無時不刻強烈感受到在身體、性別、空間等範疇被阻絕於生存城市的主流社群之外，而自願成為這個城市的遊民、幻想家和觀察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種阿 Q 式的精神，想用文字，用雜燴式的中西文學傳統，演一齣孫悟空七十二變式即興劇，「用劇場將這個城市的外觀徹底改變」 (Kingston, 1989: 30)。

參

這就是阿辛重繪他所賴以生存之城市的手法：借用美國詩人惠特曼之名，影射惠特曼所指涉的美國文學傳統 (《草葉集》 [*Leaves of Grass*] ——特別是其中的「自我之歌」 ["*Song of Myself*"]) ——成為最常被指涉的文本)¹¹ 和他對美國城市的看法，再將中國古典名著

⁹ 為配合「生鬚佬」的稱呼，此處將 Beat Generation 權譯為「披頭 (散髮) 世代」，就其含義或可譯為「頹廢世代」。事實上 Beat 一詞來源不詳，或有以為源自 Beatitude。

¹⁰ Liminal Space 之概念引自 Homi K. Bhabha，請參考 Bhabha (1994: 4, 148)。

¹¹ 《猴行者》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篇名都直接取自〈自我之歌〉，其餘各章篇名 (第五、六章) 也分別嘲仿惠特曼的其他詩作，此處不再贅述，請參考 Tanner (1995:

《西遊記》(*Journey to the West*)、¹²《三國演義》、《水滸傳》等融入。

首先，慧特曼 阿辛(Wittman Ah Sing)¹³ 此名的由來便充滿了巴巴式的雜種嘲仿。阿辛既非姓也非名，只是廣東話在名字之前慣用的發語詞，卻陰錯陽差地被海關誤以為是姓氏；這個名字充分代表了所有剛下船的華裔移民所遭受的抽象化和普遍化——成為面目模糊的大多數；但由英文來看，“Ah Sing”又可解讀為「啊，唱吧！」，¹⁴ 顯然湯亭亭暗示他是個為族群發聲的人。此外，“Wittman”一字也暗示阿辛的猴性——狡黠、戲耍、模擬、機智；¹⁵ 阿辛以慧特曼(Wittman)嘲仿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一方面以拼音的不同強調自己文化屬性的差異，另一方面以拼音的極近類似暗示他像惠特曼一樣「美國」，華裔美人的文化遺產也終將像惠特曼或任何舊金山灣區著名的詩人(諸如頹廢派詩人[Beat Poets] Bret Harte, Jack Kerouac, Allen Ginsberg, Laurence Ferlinghetti等)一樣，成為美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

阿辛以惠特曼為命名(為自己重新定位)的藍本並不令人意外，

64-65)，文中有詳細的舉例。此外莊坤良亦指出可見此書之創作「深受惠特曼多元、自由、解放精神的影響」(2002: 717)。

¹² 暗喻華人自東方西行至美國，以及華工參與美國西進開拓墾殖、建築鐵路的歷史。

¹³ 此處將 Wittman 譯為慧特曼以彰顯湯亭亭嘲仿美國詩人惠特曼(Whitman)的用意。

¹⁴ 當然湯亭亭顯然也想藉這個包含多重義涵的雜種名字，引發聯想，藉以多重寄寓：(1) 惠特曼所歌頌之具有包容性的美國文化傳統；因為此詩使人聯想到《草葉集》裏的第一首詩“*One's-Self I Sing*”。(2) 另外李根芳指出，Ah Sing 影射了 Bret Harte 的“*Plain Languages from Truthful James*”一詩中所創造的負面角色阿蒙(Ah Sin)，藉以用 Ah Sing 的學舌式(mimic)命名扭轉原詩中阿蒙被賦予的負面中國佬形象(2000: 87-89)。

¹⁵ 李根芳也提到“Wittman”暗示阿辛是個 Wit Man，再加上猴行者的形象，可謂充滿了戲耍諧謔的意味(2000: 87)。

因為惠特曼是美國文學傳統中歌頌土地、讚美城市最力的詩人。安德魯斯(Malcolm Andrews)在《惠特曼和美國城市》(“Walt Whitman and The American City”)一文中就曾提到，相對於十九世紀英國作家把新興的城市視為從古老、美麗的土地上新冒現的怪獸，惠特曼視城市為土地——亦即美國，美國就像一首未被寫就的詩篇，包含了男、女、兒童、湖泊、城市、山脈、碼頭、草原(Andrews, 1988: 179)。因此在《草葉集》中，惠特曼寫著：「永遠不斷來到的移民——有碼頭綴邊的城市和優越的海運——未經丈量的內陸——木屋和空地和野生動物和獵人和設陷阱捕獸的人 [. . .] 自由貿易 [. . .] 新形態的無盡孕育」(Andrews, 1988: 179)。惠特曼刻意破除舊大陸城鄉兩極式的偏見，擁抱民主以吸收新經驗(Andrews, 1988: 179)，正是阿辛所冀求的。出生於舊金山的阿辛因此為自己取名為慧特曼，暗示自己也繼承了這個傳統，對自己的城市不但積極擁抱讚頌，更強調它的無所不包(inclusiveness)和生生不息(regeneration)(Andrews, 1988: 182)。

對於阿辛來說，舊金山不只是一七七六年西班牙人建立的殖民城市(當時名叫 Yerba Buena)，不只是一八四六年西班牙人交給美國人的城市，不只有金山大橋和中國城，不只有頹廢派詩人，更應該有他這一代華裔詩人共同書寫、刻劃的歷史，華裔美人的形象應該被改寫，應由簡德(Arnold Genthe)所捕捉到自一八九〇年代末期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的「華埠真實生活景象」(單德興，2000: 296)的魅影中走出來，以文字為出發點，結合土地、生活，透過即興式的演出，以雜種的文化記憶，創造嶄新的生活空間。

阿辛甚至想像未來應該建立一種閱讀傳統，模擬昔時先民(包括築鐵路的華工)在西部開拓築鐵路的軌跡，帶領華裔美人進入美國文學傳統，進而積極介入美國主流社會，並喚起華裔美人的集體記憶。因此他嘗試把閱讀、行動、土地、美國文學傳統，用搭火車

旅行，並在火車上閱讀的方式，結合成他對美國文學的投入和褒貶：

在火車上，經由加州中部農業大鎮 Fresno 時讀 Saroyan；經過 Salinas Valley [sic] 時讀 Steinbeck；經過 Monterey 時讀 Cannery Row；沿著 the Big Sur Ocean 時讀 Jack Kerouac；在通往 Weed 的路上讀 *Of Mice and Man*；在 Mother Lode 時讀 Mark Twain 和 Robert Louis Stevenson [...] 穿過 Calaveras County 和 Sacramento Valley 時讀 *Roughing It*；穿過加州紅杉林時讀 John Muir；上行至落磯山脈時讀 Wallace Stegner 的 *The Big Rock Candy Mountain*；到好萊塢及 San Elmo 則讀 John Fante 的作品；橫越加州中部山谷時讀菲裔美人 Carlos Bulson 的 *America in the Heart*；多棒的一本演出節目單。一個終生以閱讀為志的工作。(Kingston, 1989: 9)

此外，阿辛還假想到奧克蘭時可以讀 Gertude Atherton 和 Jack London，到舊金山時讀 Ambrose Bierce，但拒絕讀 Frank Norris、Bret Harte 等人的作品，因為他認為他們歧視華人移民 (Kingston, 1989: 9-10)。這個西進的行為包含了加入美國文學傳統，接上早期華工移民的集體記憶，扭轉對土地、空間的想像和投射，以身體實踐積極介入，以及以孫悟空的自喻嘲仿、暗示這是美國版的「西遊記」。換言之，藉由重新模擬華人的西進，阿辛在自喻為西遊記的猴行者孫悟空之餘，也試圖將其文化記憶和族裔傳統由此模擬行為重新帶入白人定義、想像的美國空間和地理，進而由文字的再現，重新創造華裔美人的文學／文化傳統，說明華裔移民對美國文化的貢獻和非裔、歐洲裔的祖先一樣，具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這種藉由文化翻譯，¹⁶ 以不同文化記憶覆蓋於美國移民史的欲

¹⁶ 有關文化翻譯在《猴行者》一書中的大量運用，請參見莊坤良 (2002: 705-739)。

望，揭露了城市空間與社群的微妙關係。美國地理在阿辛的筆下，隨他的想像，遠颺至「珠江三角洲」，阿辛卻說那是美國人初來美洲大陸的地方，經過澳門、香港，並接上李白、杜甫的文學傳統 (Kingston, 1989: 37)；而歌頌華裔美人移民經驗的歌，則嘲仿美國民謠「O Susana!」，成為「金山歌」(Kingston, 1989: 39)；《三國演義》中的人物紛紛在阿辛的舞台出現，當阿辛告訴妻子塔娜 (Taña) 劉備的故事，他趁機竄改了故事的地理，告訴她：「他(劉備)帶領十艘快艇出發，越過長江，往南航向吳國，也就是美國人初來的地方」(Kingston, 1989: 172)。這些改寫、重繪城市、空間、地理的行為，以及疊覆想像、文化記憶、文學傳統於真實地理的嘗試，說明空間和文化記憶的關係是相對的，城市面貌隨時、地、語言文字的描述、命名，以及加入社群的文化遺產、文化記憶的介入，總是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阿辛所重繪的美國城市和空間是雜種的、多源頭的，具有後殖民論述中羊皮紙 (palimpsest) 般層層刮去重寫的多重文化背景，¹⁷ 雜駁而難標示其「單一」的源頭。他七十二變式的文化翻譯行為和移花接木的文化再現，揭示城市面貌丕變，新加入社群自我意識的抬頭和其爭取生存空間的強烈欲求。

肆

身為劇作家、詩人、嬉皮、柏克萊加大畢業生，阿辛是個深受六十年代反戰思潮和民權運動洗禮的青年。他一心恢復華裔美人英雄傳統、¹⁸ 塑造華裔美人的社區意識，以及擺脫華裔男孩陰柔形

¹⁷ 有關羊皮紙 (palimpsest) 以及其暗喻多重文化背景的概念，請參見蘇榕 (1999: 281-305)。

¹⁸ 有關阿辛所影射之趙健秀所亟欲建立的英雄傳統，以及湯亭亭對他的同情、嘲諷，與批判，已有多篇論文深入討論，此處不再詳述。請參考莊坤良 (2002: 734-735)；李根芳 (2000: 79-82)；單德興 (2000: 213-238)；張小虹 (1995: 310-311)。

象，卻又難以擺脫戀白情結（娶塔娜大半因為她是白人，而且阿辛自認為她並不因膚色、種族而歧視他）。康士林在《七十二變說原形——《猴行者：他的偽書》中的文化屬性》的結論中認為：

惠特曼有強烈的無所歸屬之感，而這源於他的族群背景。雖然他心底有份強烈的無所歸屬感，但是我們看不出他實際上受到歧視。就我所見，他所接觸的每個人都全盤接納他，不管是白人、黑人、華人或是華裔美人。常見的是，當他有所行動時，他會對一些感覺到的或想像的偏見過度反應。說來諷刺，他在其他時候的多數行為都是典型的美式作風，這意味著其實他在文化上是屬於美國的，可是自己卻不了解這一點。（1994: 86）

以上評論點出阿辛內心深處的焦慮其實來自他的無所歸屬，他在所處社會失去自我定位的座標。即或土生土長於美國，行為思考模式在文化上完全是美國式的，仍不能從種族主義論述想像性投射的網絡中獲得解放；他對空間的想像、指涉，他的「空間性歷史」，因著他的東方文化記憶、傳承、對自我形象的想像、建構，無法接上美國白人社會的歷史與傳統，因而始終找不到屬於自己的空間和位置。

對這種格格不入的另一種反擊方式，是拒絕被空間定位或固著。阿辛被玩具部門解雇、逃避兵役，成為一個游手好閒的劇作家。無疑地，他選擇成為都市中無所事事的漫遊者（flâneur）。滿懷熱情、理想，和對種族主義的挑戰，他觀察都市中人與人的關係，以觀察者的眼光不斷審視華裔美國移民如何被看待／對待，並不斷自問是膚色、髮色、眼珠的顏色、身高，還是口音使他見拒於白人圈子。如果按照簡克思在《當心你的腳步：漫遊者的歷史與實踐》（“Watching Your Step: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he Flâneur”）一文中提及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式漫遊者的說法，則

漫遊者能在空間和人群中以一種使他能取得有利視野的黏著性(viscosity)移動。[...] 漫遊者擁有一種力量，可以隨自己的意志行走，自由自在，似乎漫無目的，但同時又具有探索的好奇心，以及能了解集體活動的無限能力——通常這集體被視為「群眾」。(1995: 146)

湯亭亭筆下的阿辛也按自己的意志行走，但他卻是一個焦慮不安的漫遊者，他在人群和空間中移動時，總覺處在不恰當的位置。舊金山對他來說是土生土長的家，但他在這個家園中卻缺乏歸屬感。儘管已是第五代移民，熟悉這裏的一切地標：金門大橋、科伊特塔(Coit Tower)、劇院、市民視聽館、市政廳(Kingston, 1989: 7)，熟悉和這個城市息息相關的著名詩人、文學傳統；但這些地標、詩人、文學傳統背後所指向的歷史，卻沒有華人參與的軌跡。換言之，華裔不管在空間或時間的向度上都是「存在的空缺」(present absence)。

隨著這種無所歸屬感的增強，阿辛終於不願再屈居為觀察者，轉而成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¹⁹ 在小說的結尾，阿辛決定演出一場個人秀，並鼓勵他的族人，不論是父母、姨媽、祖父母、女友南希、妻子塔娜等都來參加。藉由凝聚華裔移民的社區意識，彰顯被刻板

¹⁹ 當然，就另一個觀點來看，所謂的「參與者」必然面對被「收編」(co-opted)和秉持文化差異的兩難。湯亭亭以趙健秀為藍本，創造了阿辛這個角色，同情他的雄心壯志也嘲諷他的焦慮，了解他的處境也清楚他的困窘。這也是為何華裔美國詩人陳美玲(Marilyn Chin)在一篇訪談中提到：

[《猴行者》]的敘述者是偉大的女性，因而他[阿辛]和她掙扎、纏鬥，並拒絕接受現實[...]。他也必須努力整合自己。還有更大的整合是和整個宇宙之間的整合。還有，和美國。(1986: 60)

小說結尾，這個女性敘述者更不忘在臨去前憐憫地調侃主角一番：「親愛的美國猴子，別害怕。來，讓我們擰擰你的這隻耳朵，再親吻你的另一隻」(Kingston, 1989: 340)。誠然，作者了解到阿辛是英雄，但當然更是值得同情、憐憫、嘲諷的英雄。

印象消音的文化記憶和文學傳統，以集體的力量用語言描述「我們存在的事實」，並用「命名」創造「空間性歷史」，從而開闢另類空間：

我們一直在這裏，在哥倫布來之前，我們沒有為自己命名。看看黑人如何漂亮地界定自己。「黑人」很棒，但我們不能是「黃人」，「我？我是黃種人」。「我是個金人」。「我們是金人」[...] 我們未被命名，我們已經消失了，我們要一個在街上和其他場合叫得出的名字 [...] 我們必須拿掉連字號——「華裔美(國)人」(Chinese American)[sic]。「美國人」是名詞，而「華裔」是形容詞。(Kingston, 1989: 326-327)

這個大聲的訴求說明命名代表新空間的誕生。如此說來，阿辛既是行走的漫遊者，也是流動的參與者；他之遊走於城市，走出中國城，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空間配置和區隔的固定性，擾亂、鬆動、改寫、重組了傅柯式的異托邦；故事結尾的獨幕劇固然有回「家」的暗示，但回到中國城的阿辛也重新繪製了這個社區的風貌，開闢了巴巴所謂的「隙縫社群」(interstitial community) (Bhabha, 1994: 231) 或「隙縫時空」(interstitial time and space) (Bhabha, 1994: 235)。²⁰ 而阿辛以七十二變的想像重新繪製華裔美人眼中的美國城市，無非是要使華裔美人也能成為美國城市主體，而非邊緣、隱形的陳查禮或傅滿洲；簡言之，即被貼上空洞抽象屬性的刻板人物。

湯亭亭自出版《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金山勇士》，以及《猴行者》以來，基於各方面的因素，以及其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刻意凸顯「異己」、「性別」等議題(單德興, 2000: 168)，很快在美國主流社會的學術建制中占得一席之地，儼然成為許多美國學

²⁰ 巴巴在〈新意如何來到這世界〉(“How Newness Enters the World”)一文中曾以瓦寇特(Derek Walcott)的詩為例，說明以命名占有空間的力量，和阿辛為自己、為美國地理命名，創造歷史頗有異曲同工之妙(Bhabha, 1994: 231)。

者與讀者心目中華裔美國文學的代表。²¹《猴行者》一書中阿辛形象的塑造，不但達到雙刃刀的效果，批判華人社會男性沙文主義和美國主流社會對華裔男性的閹割，書末阿辛最後的一場個人秀也總結了湯亭亭運用雙文化背景挪用、轉化、竄改中國俗文學傳統的企圖——以語言為華裔美人社群命名，創造傳統、爭取空間，進而重繪美國立國的想像地理空間。如果借用李有成在《行動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in Action”）裏所提到的：「裴克(Houston A. Baker, Jr.) 將黑人研究視為一種『行動的文化研究』，因為『黑人研究為黑人日常都會生活和傳統上中立的學術領域建立了關聯性』」（Lee, 1999: 223），則或許我們應以類似的期許來勉勵華裔美國文學的開疆拓土和創造空間。華裔美國文學之為美國文學新興的領域，其中或因時間、年代、階級的差異，難以籠統的屬性來描述其全貌（廖炳惠，1994: 135），²² 由湯亭亭筆下阿辛積極介入美國社會所展現的雄心壯志看來，的確為美國文學的多元文化光譜增添異色。不過，以湯亭亭為代表的華裔美國文學傳統，似乎多指向自我定位、認同，以及凝聚社區意識等議題，屬於狄瓦拉(Manthia Diawara)所

²¹ 有關湯亭亭的作品被當代美國文學史收錄，以及在大學、高中課程中被教授的詳細情形，請參見單德興(2000: 157-158)。

²² 關於美國華人的差異性，廖炳惠在〈試論黃哲倫的《航行記》〉中多有著墨：

從舊金山的唐人街到矽谷或柏克萊，沿途我們可以遇到許多中國人或東方人 [...] 然而在這些美國華人之中，他們之間的差異未必就小於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差異 [...] 當我們討論美國華人作家的文化認同時，必須考慮到此一面向。文化認同一直不斷在變，尤其是這些新作家由於有更多交流的機會，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有很多選擇性的適應或擴充，而不再像以前那種封閉性的族群所發展出來的認同政治。(1994: 135-136)

湯亭亭的文化背景，大致承接廖炳惠所提到的早期移民華人，他們大多「從事消耗體力的工作，如當製造業的勞工、鐵路工程的苦力，開餐館、當僕人，或者開洗衣店、當店員」（廖炳惠，1994: 136-137）。所以探討華裔美國文學中的文化認同，的確牽涉到階級問題。

謂的「受壓迫的研究」(oppression studies) (Lee, 1999: 223)——掙扎於「再現的迷惑／迷思」，陷入同化／疏離的兩難。除在主流文學傳統爭得一席之地，華裔美國文學能否如黑人文學般，散發薩依德(Edward W. Said)式入世性(worldliness)，批判、針砭美國社會現況，經由介入加入新價值觀，這些恐都是在重繪美國城市，爭取生存空間，以及據用文化記憶之外值得努力的嶄新方向。²³

²³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第八屆美國文學研討會，主題定為「階級與美國文學」，其中單德興為文探討菲裔美國詩人卜婁杉(Carlos Bulson)的 *America in the Heart*，張瓊惠討論日裔美國小說家大衛·村山(David Murayama)的作品，足見整體而言，亞裔美國文學研究已注意到將空間和地理性擴及美國本土之外，而議題也已觸及階級。

參考文獻

- 史書美(1991)。 放逐與互涉：湯亭亭之《中國男子》 ，《中外文學》 ， 20, 1: 151-164。
- 何文敬(1994)。 斷裂與延續：朱路易《吃一碗茶》裏的文化屬性 ，單德興、何文敬(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頁 89-133。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李有成(1994)。 《唐老亞》中的記憶政治 ，單德興、何文敬(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頁 115-132。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李根芳(2000)。 翻譯者是叛徒：解讀湯亭亭的《猴行者》 ，《中外文學》 ， 29, 6: 77-99。
- 康士林(1994)。 七十二變說原形——《猴行者：他的偽書》中的文化屬性 ，單德興、何文敬(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頁 61-78。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張小虹(1994)。 雜種猴子：解／構族裔本源與文化傳承 ，單德興、何文敬(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頁 39-60。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張小虹(1995)。 獨腳戲：《猴行者》中的性別越界 ，何文敬(編)，《第四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文學篇》，頁 295-315。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莊坤良(2002)。 文化翻譯和湯亭亭的三重猴戲 ，《歐美研究》 ， 32, 4: 705-739。
- 單德興(2000)。《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
- 單德興、何文敬編(1994)。《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廖炳惠(1994)。 游離族群與文化認同：試論黃哲倫的《航行記》 ，單德興、何文敬(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頁 133-150。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蘇榕(1999)。 層層刮覆的家族史話／畫——論《墨爾人臨去之嘆》 ，馮品佳(編)，《外國文學研究在台灣》，頁 218-305。新竹：交通大學。
- Andrews, M. (1988). Walt Whitman and the American city. In G. Clarke (Ed.), *The American city: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London: Vision Press.

-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Carter, P., & Malouf, D. (1989). Spatial history. *Textual Practice*, 3: 173-183.
- Chin, F. (1991). *Donald Duk*.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ress.
- Chin, M. (1968, Winter). A *MELUS* Interview: Maxine Hong Kingston. *MELUS*, 16, 4: 60.
- Cross, M., & Keith, M. (Eds.). (1993). *Racism, the city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 Foucault, M. (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Spring: 22-27.
- Foucault, M.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G. Burchell, C. Gordon &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 87-104). Great Brita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 (1993). Space, power, and knowledge. In S.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p. 161-169). London: Routledge.
- Hall, S. (1987). Minimal selves. *Identity: The real me* (ICA Documents 6, pp. 44-46).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 Hall, S. (1989a).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 36: 68-81.
- Hall, S. (1989b). 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Radical America*, 23, 4: 9-12.
-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 T.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pp. 273-326). Cambridge: Polity.
- Hurston, Z. N. (1985). *Spunk*. Berkeley, CA: Turtle Island Foundation.
- Jenks, C. (1995). Watching your step: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he flâneur. In C. Jenks (Ed.), *Visual culture* (pp. 142-16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ingston, M. H. (湯亭亭) (1989).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New York: Vint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6)
- Lee, Y.-C. (1999). Cultural studies in action. In M. Diedrich, C. Pedersen & J. Tally (Eds.), *Mapping African America: History,*

narrative form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pp. 221-231). Hamburg: LIT.

Lowe, L. (駱里山) (1996).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Tanner, J. T. F. (1995, Winter). Walt Whitman's presence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MELUS*, 20, 4: 61-74.

Westwood, S., & Williams, J. (Eds.). (1997). *Imagining cities: Scripts, signs, mem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mapping the City:
Ethnic Space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Jung Su

Abstract

This essay re-evaluates Maxine Hong Kingston's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in the light of Foucauldian spatiality. It examines how diaspora communities resist ghettoiz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critiquing the racialization of space. The protagonist, Wittman Ah Sing, born in the Chinatown of San Francisco, endeavors to transcend the confines of Chinatown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mainstream society. Being a deviant, Ah Sing challenges dominant discourse and cultivates an interstitial space by adopting a strategy of renaming. Apart from that, he manages to re-map a new cityscape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y reading in a train westward, a symbolic act that combines the act of reading with the crossing of boundaries to re-invent a new tradi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end, returning to Chinatown, Ah Sing the flâneur encourages his kinfolk to represent themselves with a brand new image.

By creating a character like Ah Sing, Kingston adds an unlooked-for color to the spectrum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spite of that success, avoiding the lure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binarism of assimilation/alienation and thereby working toward a commitment to Saidian worldliness remains a challenge for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Key Words: City, Kingston, space, heterotopia, Foucault